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

A STUDY OF GEOFFREY BARRACLOUGH'S GLOBAL HISTORY

— 董欣洁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董欣洁

#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

A STUDY OF GEOFFREY BARRACLOUGH'S GLOBAL HISTORY

董欣洁 著

ISBN 978-7-5004-8010-9  
定 价：35.00 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 / 董欣洁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7-5203-1168-7

I. ①巴… II. ①董…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4828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王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 序言一

这部即将面世的《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是董欣洁博士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重点课题的最终成果。在当今国内外史坛，“全球史”始终是一个受到热议的话题。在近年成立的诸多的研究中心及新问世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出版物中，在高校历史系的课堂上，离不开“全球史”。在国内外，“全球史”并非风靡一时，尽管它已经“热”了二三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是方兴未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与欧美国家相比，这种“热”在中国往往还有自己的特点，即各种译著、译文、译文集数量很多，而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性成果则明显要少。而在这些不多的成果中，能够自觉地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联系起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就更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董欣洁博士的《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则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董欣洁博士的这部专著可被视为近年我国全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中国史学界，大家对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并不陌生，此人著述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当代史导论》、《处于变动中的历史学》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等，在国际史坛颇享盛名。《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有两个中文译本，在中国广为流传。它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的第三卷，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势有系统、全面、详细的阐释和分析，被欧美大学列为史学史研究的必读参考书。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巴勒克拉夫在上述著作中，对“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不少观点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尽管巴勒克拉夫晚年疾病缠身，在1984年辞世，但其“全球史”的理论，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今日的国内外史坛，关于全球化或全球史的著述目不暇接，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但究其理论渊源，大多离不开巴勒克拉夫。有论者认为，不懂得巴勒克拉夫，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全球史”，这种说法似有些武断，但却不无道理。究竟是否如此，相信读者通过阅读《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会有自己的判断。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即使是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也要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即所谓“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代史”。在《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除学术史的回顾外，作者正是在“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的提出”、“巴勒克拉夫对欧洲历史的反思”、“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和“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框架”等研究过程叙述的基础上，对“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的价值与局限”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这样，作者提出的结论植根于“考实”的广厚基础上，与一般的空泛议论相比，就有更强的说服力。

作者认为，巴勒克拉夫作为一个变动剧烈的历史时代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全球史研究实践不仅对西方传统世界史编撰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为西方史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和编撰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出发点，大大扩展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不过，他并没能构建出一个系统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其全球史研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巴勒克拉夫虽然“没能构建出一个系统的世界史理论框架”，但他毕竟清晰地看到了“二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世界政治版图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敏锐地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催生了一系列新兴国家的诞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到来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历史，这已属难能可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以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仍在困扰着史学界，那就是研究外国史和外国史学理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歧见纷呈，似乎几句话说不清楚，但笔者以为，这本

著作本身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而且作者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延伸，也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作者在结语中提出：新时代呼唤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研究中，只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才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中国史学优秀传统与当代世界史研究实践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中国世界史研究与国际史坛的交流与合作，广泛汲取营养，从而将当代中国的世界历史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董欣洁博士早年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历史系的本科生到世界历史系的博士生，接受了系统的、严格的历史学专业的培养和训练。她好学深思，自施压力，努力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提高理论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在研究实践中关注现实，不断深化对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认识。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这部著作的问世，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她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后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

我作为她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指导教师，有机会对这部书稿先睹为快，阅读的过程中，自然会联想到在校就读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情况，对书稿中的内容，也难免产生一些新的想法，现一并记下，是为序。

于沛

2017年9月

## 序言二

在当今史学界，全球史已经成了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冠之以“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的各种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这是史学工作者面对全球化浪潮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或者说是现实生活中的全球化在史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一种必然回响，是时代潮流所使然。

一般认为，全球史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世界各地。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全球史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兴起过程，这种看法颇有一分道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史在西方国家没有发展成为教育体制上的一个学科，西方的世界史大多仍然以通俗读物或历史哲学的面貌出现。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西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突破民族国家框架的历史研究和著作越来越多，世界史（全球史）作为一种学术趋势在西方国家也日益显现，同时世界史（全球史）专业学科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美国，随着世界史研究的深入和教学的推广，继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之后，夏威夷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出现了世界史博士生培养项目。到90年代，美国东北大学、乔治亚州立大学以及加州大学的河滨分校、尔湾分校、圣克鲁兹分校，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与此同时，由杰里·本特利担任主编的《世界历史杂志》也在1990年创刊，为世界史（全球史）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1992年，美国从事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从业人员，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独立举办的世界史学会的年会，而且世界史学会也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的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出台了世界史的国家教

学标准，从此“世界史”教学在美国得到了官方认可。这样，“世界史”（全球史）作为一个专业或学科在美国出现了。

美国的许多学者在从事其全球史研究和教学时，并没有使用“全球史”而仍然沿用了“世界史”（world history）这一名称。但是，这些“世界史”在史学理念、研究方法和书写内容上已不同于传统的世界史。这一新兴领域以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跨民族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包括世界通史编撰和历史上的世界体系、跨文化贸易和交流、离散社群与移民、帝国与扩张、海洋区域、大范围生态环境变迁、大历史等主题，而地区史和国别史被排除在外。<sup>①</sup> 随后，美国的“世界史”（全球史）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运用于历史学各个领域，并在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时期的欧洲大学相对保守，全球史研究和教学并没有普遍开展起来。

全球史研究既然首先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大多数学者在追寻这一新兴史学潮流的兴起时，自然要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为此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几位美国学者：马歇尔·霍奇森、威廉·麦克尼尔和列夫顿·斯塔夫里阿诺斯。霍奇森在其早年发表的《世界史和世界观》一文中，批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提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从总体上建立一种‘全球的’（global）世界观”。<sup>②</sup> 1954 年他发表《作为一种世界史方法的半球区际史》一文，开始探索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其后他的《伊斯兰文明的历程》更是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麦克尼尔于 1949 年出版的教材《西方文明史纲》，在内容编排上体现出了一种世界史视野的萌芽。他在 1963 年出版的成名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中，用中心与边缘之间文明互动和文化传播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变迁。随后，他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开拓

<sup>①</sup> 关于美国的“world history”与中国的“世界史”之间的异同，以及中国的“世界史”与“全球史”之间的异同，参见刘文明《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5 页。

<sup>②</sup> Marshall G. S.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Edited by Edmund Burke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8.

性的全球史著作。1962年，斯塔夫里阿诺斯主编的教材《人类全球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了概要性描述，并试图克服以往世界史中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这一点在其后来的《全球通史》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达。这三位学者对全球史的开创之功，得到当今全球史学界的广泛认可，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撰文探讨他们的全球史思想。

然而，与上述美国学者几乎同时代的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同样在20世纪中叶便大力提倡全球史观，却似乎没有在当今西方的世界史学界获得其美国同行那种殊荣。在当今西方诸多全球史著作中，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霍奇森、菲利普·柯丁、贡德·弗兰克、杰里·本特利等人及其著述被大量提及和引用，而巴勒克拉夫似乎被遗忘了。例如，在近年颇有影响的几本概论性全球史著作中，包括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的《世界史导航》（2003），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什么是全球史》（2008），入江昭（Akira Iriye）的《全球史与跨国史》（2013），迪戈·奥尔斯泰因（Diego Olstein）的《全球性地思考历史》（2015），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的《什么是全球史》（2016）等，书中均未提及巴勒克拉夫。在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视野中的全球史》（2011）中，虽然提及巴勒克拉夫及其著作《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但也是在介绍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时提到的。更有意思的是，罗斯·邓恩（Ross E. Dunn）在2000年主编的《新世界史》一书中收录了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的前景》一文，但在2016年的新版《新世界史》中，该文被删去了。在该书第二章“定义世界史：一些关键表述”中，编者试图向读者介绍一些对“全球史”的权威界定，旧版收录的是马歇尔·霍奇森、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埃里克·沃尔夫、菲利普·柯丁和威廉·麦克尼尔的文章，而新版中删去了巴勒克拉夫和沃尔夫，保留了霍奇森、麦克尼尔、柯丁，增加了贡德·弗兰克、杰里·本特利和梅里·维斯纳-汉克斯（Merry Wiesner-Hanks）。<sup>①</sup> 迄今为止，在英文学术期刊库JSTOR

<sup>①</sup> Ross E. Dunn, ed., *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Bedford/St. Martin's, 2000. Ross E. Dunn, Laura J. Mitchell, and Kerry Ward, eds., *The New World History: A Field Guide for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中，能够检索到的研究巴勒克拉夫史学思想的论文仅有一篇，即肯尼思·杜瓦（Kenneth C. Dewar）在1994年发表的《巴勒克拉夫：从历史主义到历史科学》，而这篇文章也不是专门探讨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思想。

事实上，虽然全球史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首先兴起于美国，并且作为一种史学思潮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学者拥有全球史的“发明”专利，董欣洁博士的专著《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表明，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为全球史的兴起与发展贡献出他的智慧和思想。关于巴勒克拉夫在全球史兴起过程中的学术地位，笔者在此想借用与他同时代的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加以说明。斯塔夫里阿诺斯于1965年在评价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时说：“正如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展示了一种探讨人类史的全球方法（global approach）所具有的可行性和创造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这一研究再次表明了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的丰硕成果，即使其时段限制在不到一个世纪的范围内。”<sup>①</sup>这句话表明，斯塔夫里阿诺斯不仅把《当代史导论》看作在运用全球史方法及其创造性上可以与《西方的兴起》媲美，而且认为它是一部不同于通史性《西方的兴起》的全球史著作，因为它探讨的仅仅是1890—1961年间的世界史。所以他又评价说：“这一部重要的和激动人心的著作，原因不是由于作者所选主题的新颖，而是由于研究视角及其思想的原创性。”<sup>②</sup>如果考虑到《西方的兴起》（1963）和《当代史导论》（1964）两书的出版时间相距甚近，而且两位作者分别身居美国和英国，那么很难说巴勒克拉夫的著述受到了威廉·麦克尼尔的影响。更何况，巴勒克拉夫早在1955年便出版了以全球视野来考察历史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这本文集收录了他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15篇论文。

<sup>①</sup> L. S. Stavrianos, “Reviewed Work (s):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by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7, No. 2, Jun., 1965, pp. 274–275.

<sup>②</sup> Ibid.

巴勒克拉夫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主要聚焦于对欧洲历史的反思。一方面，他提出把欧洲历史置于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认为欧洲与外界的联系是塑造欧洲历史的极为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他认为欧洲由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欧洲之外强国的兴起，造成了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下降，欧洲均势时代走向终结，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因此，他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主张从全球观和整体观出发来考察历史。这一治史理念的实践集中体现在其《当代史导论》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如果说巴勒克拉夫在反对“欧洲中心论”和提倡全球史观方面与同时代的美国全球史学者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主义的批评和在全球化趋势下对当代世界的整体把握。他认为，历史主义强调特殊性、个别性和连续性，妨碍了人们对普遍性、整体性和非连续性的把握，只有放弃了这种历史主义，才能避免“欧洲中心论”并且用全球史观来审视历史。巴勒克拉夫看到了世界进入20世纪后“朝向全球联系的局势的演变”，人类进入一个欧洲走向衰落和全球政治时代来临的“新世界”，因此他特别强调以全球观来理解当代世界变迁。最终，巴勒克拉夫将其对世界史（全球史）的理论思考在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作了集中阐述。他说：“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这种世界历史与其说是关心时代的发展及历史的目标和意义（非西方文化基本上不关心这些西方所关心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关心各个地方的人类所面临的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反应。对于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才是世界历史的本质。”<sup>①</sup>换言之，在他看来，全球史的本质就是从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来探讨世界各地所面临（而不是西方所关心）的问题。

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的研究代表了欧洲学者的一种探索性思考。

<sup>①</sup>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因此，探讨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全球史的兴起及推动全球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一书在国内外学术界第一次对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及其全球史治史实践作了全面探讨，包括巴勒克拉夫提出全球史观、对欧洲历史的反思、对全球史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书写全球史的实践及其基本框架等，将这个几乎被当今西方全球史学者遗忘了的英国史学家对全球史的先驱性探索呈现给了读者。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评述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指出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框架对世界史编撰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个变动剧烈的历史时代中的代表人物，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的意义也许更多地在于他提出了什么问题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何种可能的途径，而不是他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巴勒克拉夫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在 20 世纪中期为西方史学界甚至整个国际史坛的世界史研究和编撰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从全球史发展的学术史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一直存在争鸣，而董欣洁博士在《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将巴勒克拉夫的观点放在这种学术争鸣的背景下来理解，凸显了巴勒克拉夫作为 20 世纪中期全球史观首倡者的洞见及其前瞻性。她指出：“巴勒克拉夫的一些主要观点，成为西方全球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考系。”例如，帕特里克·曼宁、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迪戈·奥尔斯泰、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等全球史学者在思考全球史的本质特征时，都强调联系和互动，这正是巴勒克拉夫在几十年前所表述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一书不仅在全面把握当今西方全球史学术状况的基础上，对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作了系统的阐述，而且还探讨了其对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意义，体现了作者对当今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现实关怀及相关思考。该书以“新时代呼唤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作为结语，印证了作者书写这一专著的现实出发点。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和全球史实践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正是由于

巴勒克拉夫的开拓性学术贡献被西方世界史学界所遗忘，对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进行全面探讨和阐述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这正是《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一书的主要学术价值所在。

刘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2017年9月

“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历史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殖民地时期，“殖民地”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称呼，而“帝国”则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称。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称呼，而“帝国”则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称。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称呼，而“帝国”则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称。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称呼，而“帝国”则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称。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称呼，而“帝国”则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称。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称呼，而“帝国”则是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称。殖民地时期的“殖民地”与“帝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 前 言

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超越，已经成为非西方国家学术界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也予以高度的重视。众多的研究者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0世纪中叶，由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最早明确提出的全球史观就是其中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发展，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研究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自20世纪中期提出以来，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对全球史问题多有关注，但是至今还很少见到关于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的系统专著，较有影响的成果尚不多见。

对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实践进行考察，从史学理论层面来看，能够为我国世界史研究整体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支持；从现实层面来看，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全球史、对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及其引发问题的深刻思考，开拓研究视野和开发新的学术增长点。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对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其学术价值与局限，对其进行合理的历史定位。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尽可能地充分占有外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归纳、比较与理论分析。

基本写作框架简要介绍如下。

导论系统梳理了西方全球史学者对“什么是全球史”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将全球史界定为全

球化时代的世界史，指出其发展的内在阶段性，认为中国的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都是广义全球史的组成部分，这有利于理顺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学科关系，将全球史纳入到我们自身的世界史框架之内；同时，这也为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在西方全球史发展中的历史定位提供了学术背景。

第一章主要内容为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问题的学术史回顾，不仅介绍了相关著作的版本资料情况和国外学者对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的评析，还介绍了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对全球史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即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全球史观不仅是历史学本身不断演变的产物，而且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本书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历史学领域的变革两方面入手，分析了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在 20 世纪中期的提出，指出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与深刻理解成为巴勒克拉夫批判“欧洲中心论”和探索全球史观的研究切入点和独特视角。

第三章分析了巴勒克拉夫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出发对一系列传统欧洲历史观念进行的反思和重新解读。他对欧洲历史的解读主要从五个方面的内容入手：欧洲与欧洲的“统一”、欧洲文明、欧洲历史的“终结”、欧洲的遗产、欧洲的困境。通过对欧洲历史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四章归纳和总结了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概括指出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在历史认识论方面，他批判了传统的历史主义，并对传统的线性进步史观持怀疑态度，认为应当采取文明循环理论。他强调对历史的中立判断，在历史研究中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在方法论方面，他认为，全球史观应当通过对一切时代和地区的人类制度、习俗、思想等进行比较研究来实现，借此开辟通往“真正的世界史”的道路。他认为全球史是科学的历史学题中应有之义。